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2.547

《饥饿的路》中的非洲女性困境

蓝婷¹

(¹ 四川外国语大学, 重庆 400031)

摘要: 本·奥克瑞的布克奖获奖小说《饥饿的路》通过魔幻现实主义叙事, 以约鲁巴文化中的阿比库鬼孩传说为基点, 揭示了后殖民时期尼日利亚社会转型中非洲女性面临的交叉性压迫。研究聚焦小说中母亲与蔻朵大婶等女性形象, 将非洲本土女性主义理论与生殖正义学说、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相融合, 指出蔻朵大婶的经济突围与母亲的有限反抗构成了非洲女性主体性建构的辩证图景。通过约鲁巴学者奥耶武米的文化特殊性理论, 论证当代未婚生育污名实为前殖民时期母系传统遭遇现代性侵蚀的症候, 挑战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普适性预设。

关键词: 母职规训; 生殖正义; 交叉性压迫

1. 引言

作为当代非洲文学在后殖民语境下的重要突破, 本·奥克瑞 (Ben Okri, 1959-) 的布克奖获奖作品《饥饿的路》(1991) 以非洲本土的“阿比库” (Abiku) 鬼孩传说为叙事支点, 构建了一个交织着约鲁巴宇宙观与现代性批判的寓言世界。这部与《迷魂之歌》《无尽的财富》并称“阿比库三部曲”的魔幻现实主义经典, 通过幽灵叙事者阿扎罗的视角, 折射出后殖民时期尼日利亚社会转型中的多重困境。小说中女性角色在生存、生育与生产维度的命运轨迹, 恰似一面棱镜, 将非洲大陆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政治问题分解为光谱式的存在论危机。

国际学界对奥克瑞创作的研究已形成多维阐释体系。阿托·夸伊森 (Ato Quayson, 1997) 开创性地揭示了小说对非洲口头传统与西方现代叙事的辩证融合, 指出其“通过幽灵叙事解构殖民现代性的认识论暴力”的文本策略。这种批判视角在后续研究中得到延伸: 詹姆斯 (2007) 关注小说中的城市空间政治, 恩瓦帕 (2012) 则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解读自然书写。值得注意的是, 西方学界对作品中性别问题的讨论多集中于母性神话的解构 (Nnolim, 2005), 而较少触及劳动异化与生殖正义等交叉性议题。

中国对奥克瑞的接受史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瞿世镜 (1997) 最早将其定位为“非洲后现代小说的开拓者”, 但此后十余年间研究几近停滞。2009年后, 以朱振武团队为代表的学者重启研究, 运用后殖民理论解析小说中的文化身份问题, 提出“第三空间”理论框架下的非洲书写范式 (朱振武、韩文婷, 2017)。近五年研究焦点转向叙事诗学, 彭玲 (2020) 的魔幻现实主义研究虽具突破性, 却仍未触及文本深层的性别政治维度。这种研究空白与非洲本土批评形成鲜明对照——尼日利亚女性主义学者已开始重审奥克瑞创作中的性别表征 (Ogundipe-Leslie, 2018), 揭示其叙事中潜藏的父权制批判。

本研究具有双重学术价值: 在实践层面, 通过性别视角的介入, 重新发现《饥饿的路》中被叙事迷雾遮蔽的女性抗争话语, 为尼日利亚文学研究提供新的解码路径; 在理论层面, 借助非洲本土学者奥耶武米 (Oyewùní, 2018) 的约鲁巴女性主义学说, 建构兼顾文化特殊性与理论批判性的分析模型, 推动中国学界对非洲英语文学的研究走向本体论层面的深度对话。

[作者简介]

蓝婷 (1999-), 女, 云南临沧人, 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非洲文学。

[基金项目]

2024年四川外国语大学一流学科和重点学科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 项目名称: 本·奥克瑞“阿比库三部曲”中女性形象的马克思主义转向 (项目编号: SISU2024XK082)

2. 母职规训与生殖正义的缺失

2.1 作为社会义务的母职

《饥饿的路》在开篇就以一个不愿意降生到人间的鬼孩视角进行自述：“我们当中没有谁愿意降生到人间。我们讨厌生存的残酷、无法实现的渴望、被奉为圭臬的人间不公、歧路交错的爱、父母的无知、走向死亡的事实，以及生者面对宇宙间质朴的美好事物时表现出的惊人的麻木。”（奥克瑞，1991：3）根据上世纪末的一篇报道，衰退中的非洲社会面临着逐年增高的儿童死亡率，特别是当母亲的主要收入来自非农业渠道时和生活在多成员家庭中，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更加凸显，暗示母职责任与生存资源的结构矛盾。

非洲许多家庭中男女的结合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而非基于爱情。借由“人口资本”和“社会安全感”，家庭中可以通过多子多孙来增强其经济和社会地位。而对女性来说，这种高生育期望带来了巨大的困境，也让她沦为生物工具，使得女性的主体性在“社会安全感”的宏大叙事中被消解。劳雷塔（1988）指出，如果一个家庭没有子嗣，社会往往不会同情夫妻或女性的痛苦，反而会认为未出生的孩子在“哭嚎”，责备母亲没有“解救”他们，没能给她/他生命。情感上的孤立和被责备加剧了女性的痛苦，使得她们在婚姻和生育的决策中处于更加被动和受限制。

基于此，女性的生育不仅仅是个体选择的结果，更是面临社会责任。在非洲大陆上的众多国家、族群、团体秉持多生育主义的大背景下，阿扎罗一家却是典型的核心家庭模式，即一夫一妻一子，构成对传统生育主义的反叛。相较之下，阿扎罗的朋友埃德家的传统大家庭则暴露了性别权力的拓扑结构。一夫多妻制不仅是性别的压迫装置，更是劳动剥削的空间配置。女性在生产与再生产的双重系统中异化：既要承担田间劳作的经济生产，又需完成人口再生产的生物性使命。通过房间分配、食物配给等微观权力技术，拓扑结构将女性禁锢在从属位置。而母亲对独子阿扎罗生存的执着，暗含对生育主义逻辑的有限反抗，即通过精心养护独子来解构“多生育=高地位”的社会公式。

2.2 未婚生育污名化

在许多非洲社会，未婚生育的女性常常被视为不道德甚至不受欢迎的存在，这种污名化不仅仅是文化传统的产物，更深刻反映了殖民遗产和现代资本主义对生育的压迫。在小说中，蔻朵大婶作为一个非传统的女性，不仅是成功的商人和女性政治领导者，还承担着未来母亲的角色。即使拥有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可未婚生育仍然使她遭到社会的蔑视，酒铺里人们窃窃私语，谈论的都是她的私人生活。另一方面，在奥克瑞笔下，蔻朵大婶的外貌从一开始的“精明能干”逐渐变成“大腹便便”，腹中怀着“不肯降生的怪物”

（2003:315）。这样带有明显的污名化意味的形象，否定了蔻朵大婶前期的成就，使她在小说中看起来“不正常”。在非洲的社会中，类似的未婚生育不仅与个体道德有关，更是后殖民时期对生育的控制和现代人口政策的资本化体现。

在殖民遗产的影响下，女性的生育能力成了一种“资源”，用于巩固种族、阶级和性别结构。而在现代经济体制中，女性的生育行为往往与国家的人口政策挂钩，被看作是一个具有经济和社会价值的“资本”。在美国第三波女性主义浪潮中，生殖正义（Reproductive Justice）这一诉求格外显眼。人们呼吁生育权利与社会正义的交叉性，要求种族、阶级与性别压迫得到系统性消解。但在非洲大陆，这一概念遭遇了三重历史褶皱的撕裂。尼日利亚籍作家布奇·埃梅切塔（Buchi Emecheta）在《二等公民》（*Second Class Citizen*）中描绘的未婚母亲困境，也折射出殖民道德规训。

作为男性作家，奥克瑞的叙事视角折射出在非洲社会中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观念，强化了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生育角色的规范性，而蔻朵大婶的身份也被异化，成为“道德缺失”的形象。他的叙述传达了对未婚生育女性的道德审判，视其为偏离“正常”社会角色的存在。蔻朵大婶在小说中既展示了女性试图突破传统束缚、追求经济和社会独立的一面，也反映了她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社会污名化和压制的挑战。人类学家奥耶隆克·奥耶武米（Oyeronke Oyewumi）关于约鲁巴社会前殖民时期母系继承制的研究显示，当代对未婚母亲的污名化实为父权制与殖民现代性共谋的产物。（2018:341）在提出她的论点时，奥耶武米引用了一系列的约鲁巴学者，诸如奠基人塞缪尔·约翰逊（《约鲁巴史》一书的作者），或是当代的约鲁巴历史学家、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她称这些学者——通常是男性——为“性别支配者”，因为他们在约鲁巴社会中施加了性别等级制度，并与殖民机构和基督教传教团一起，共同构建了一个男权主导、女性从属的社会。

3. 交叉性压迫下的劳动异化

3.1 无偿家务劳动

尽管进入近现代社会，非洲绝大部分妇女的家务责任依然由传统社会结构决定，且这种无偿劳动通常是她们在出生之前便被内化的社会经验。在小说中，阿扎罗的母亲始终默默承担家庭运作的重担，从做饭、刷碗、洗衣，到细心照料儿子与丈夫，所有家务劳动均未得到任何形式的回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指出，生产和再生产的区分实质上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机制，女性的无偿劳动不仅保障了男性在外部市场的劳动力得以持续发挥，也使得女性的经济贡献在社会中被隐形化、贬低。正如希尔维亚·费代里奇 (Sylvia Federici) 所阐述，家庭中的再生产劳动 (例如家务劳动和育儿) 并未被资本主义经济承认，且不被视为“生产性”劳动，因此自然无法获得任何报酬 (2012:33)。

随着家中的经济负担加重，阿扎罗的母亲尝试了小本经营。然而，当她走出丈夫说了算的家庭，前往集市上吆喝做买卖时，却因打手的骚扰而无法正常经营。作为象征公共领域的集市里依然是男性的天下，女性难以在其中实现真正的独立与自由。这一情节揭示了社会结构与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是围绕男性展开，即使女性在公共领域从事生产活动，她们也难以摆脱这种制度性的束缚。

3.2 有偿劳动的陷阱

作为女性独立经济活动的典型代表，蔻朵大婶无疑与传统家庭中的妇女截然不同。由于迟迟没有子嗣，蔻朵大婶较少受到母职规训的束缚。她率先投身商界，经营酒铺不仅为她提供了经济来源，也成为她在社会中权力关系的象征。酒铺内的顾客大多为男性，蔻朵大婶在这个小小的社会空间内拥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表面上看，她似乎享有经济自由，并处于社会的高位，但实际上，她的权力仍然局限于特定的空间和经济活动范围内。

然而，作为女性经营者，蔻朵大婶时常面临男性顾客的骚扰、捣乱与拖欠账单等问题。为了维持生计，她从最初对男性顾客保持冷漠，到后来主动寻求有权势的政客为酒铺站台。这一转变反映了她在权力和资源之间不断进行的权衡与博弈，且她的目光因贪婪与坚韧而显得愈发锐利。蔻朵大婶在劳动中逐渐将其定义为有偿工作，并在与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结构的对抗中不断前行，但她始终未能完全脱离由男性主导的经济体系，且深陷其中。这一现象与费代里奇对女性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再生产劳动的分析不谋而合——即女性的“经济自由”在这些结构性限制下，往往无法实现真正的解放。

4. 结语

本·奥克瑞在《饥饿的路》中构建的多维性别政治图景，揭示了后殖民时期非洲女性在传统规训、殖民遗产与现代性转型夹缝中的生存困境。研究发现：在生育维度，传统母职规训与殖民现代性共谋导致生殖正义的体制性缺失，多生育主义的社会公式与核心家庭模式形成张力，未婚生育污名化现象折射出父权制与殖民遗产的双重规训；在生产领域，无偿家务劳动与受限的有偿劳动构成性别压迫的拓扑结构，女性在家庭再生产与市场生产中的双重异化暴露了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共谋机制；在生存层面，女性身体成为传统习俗、殖民遗产与资本逻辑竞逐的战场，公共空间的经济活动突破仍难逃男性主导秩序的控制。这种跨文化阐释框架的建立，不仅为尼日利亚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解码路径，更推动了中国学界超越后殖民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窠臼，在非洲英语文学研究中实现本体论层面的理论对话。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至奥克瑞“阿比库三部曲”的互文性解读，探讨非洲女性如何在魔幻现实主义叙事中构建抵抗诗学，以及这种文学表征与当代非洲社会运动的现实关联。

参考文献：

- [1]Armfred, Signe. "Review: Gender and Power in Modern Yoruba." [J].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59, no. 2, 2018, pp. 341-342. Review of What Gender is Motherhood? Changing Yoruba Ideals of Power, Procreation and Identity in the Age of Modernity, by Oyèrónké Oyewùmí.
- [2]Ato,Quayson. "Protocols of Representation and the Problems of Constituting an African 'Gnosis': Achebe and Okri." [J]. The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 Vol. 27, The Politics of Postcolonial Criticism (1997), pp. 137-149.
- [3]Buchi, Emecheta. Second-Class citizen.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75."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Writing, 15(1), pp. 71-72
- [4]Federici, Sylvia. *Revolution at Point Zero: Housework, Reproduction, and Feminist Struggle*. [M]. PM Press,

2012.

- [5]Lauretta Ngcobo. *Motherhood, legend and reality about African Women*. Second African Writers' conference, Stockholm 1986, ed. [C]. Kirsten H. Petersen, pp. 173-181. Uppsala: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1988.
- [8]Molara Ogundipe-Leslie, *Re-Creating Ourselves: African Women and Critical Transformation*. 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1994), p. 3.
- [9]Nnolim, C. (2005). Deconstructing the maternal myth in African postcolonial fiction.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40 (2), 45-60.
- [10]Oyèrónké Oyewúmi, "Introduction: Feminism, Sisterhood, and Other Foreign Relations," in *African Women and Feminism: Reflecting on the Politics of Sisterhood*, ed. Oyewúmi. Trenton: Africa World Press, 2003, p1.
- [11] 本·奥克里.饥饿的路[M]. 王维东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 [12] 瞿世镜.(1997).非洲后现代小说的开拓者——本·奥克里创作初探.外国文学动态, (5), 32-35
- [12]彭玲. 本·奥克里《饥饿的路》的魔幻现实主义解读[D].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20.
- [13]朱振武, 韩文婷. 三重空间视阈下的非洲书写——以本·奥克里《饥饿的路》为中心[J].当代外国文学, 2017(4): 60-68.

The African Female Dilemma in The Famished Road

Ting Lan¹

¹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Abstract: Ben Okri's Book Prize-winning novel *The Famished Road*, though its magic realist narrative rooted in the Yoruba myth of the Abiku spirit-child, unveils the intersectional oppression faced by African women during Nigeria's postcoloni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Focusing on maternal figures such as Azaro's mother and Mrs. Koto, this study employ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hat synthesizes African indigenous feminism, reproductive justice theory, and Marxist feminism, arguing that Mrs. Koto's economic resistance and the mother's limited defiance constitute a dialectical portrait of African female subjectivity. Drawing on Yoruba scholar Oyèwùmí's theory of cultural particularity,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contemporary stigmatization of unmarried motherhood constitutes a symptomatic manifestation of pre-colonial matrilineal traditions eroded by modernity, thereby challenging the universalist presuppositions inherent in Western feminist theories.

Keywords: motherhood penalty; reproductive justice; intersectional oppression